

# 抨击与憧憬: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为主<sup>\*①</sup>

侯运华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摘要:** 晚清小说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呈现出多向性特点,有对专制政体的批判和对立宪政体的赞颂,有对共和政体的抨击,有对“文明专制”政体的向往以及超越地球的极端想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政治氛围使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有关,也不能忽视梁启超的理论倡导与小说创作的影响。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启迪后人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建设民族国家,思考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晚清小说;民族国家想象;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14)03-0026-14

中国近代小说生成于中国传统国家形态渐趋崩溃、现代国家形态尚未产生的社会转型期,受作家主体意识的制约,文本中蕴含着对传统国家形态的极力贬抑、抨击和揭露,同时,对中国未来亦进行多维度描摹,以期予国人充分的信心和改革的力量。于是,在中国近代小说中便存在较为充实的民族国家想象。由于近代小说文本繁多,而本文的承载能力有限,故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等流派为主,论述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问题。本文的“民族国家想象”借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他认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被想象为限度的、享有主权的共同

体,“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sup>②</sup>与安德森偏重想象的共同体不同,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则强调在原有族群历史上的“重新建构”。<sup>③</sup>笔者论述晚清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问题,即侧重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新建构”。对此问题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侧重宏观概括如旷新年、耿传明的论文,或局限于特定文本如欧阳健研究《新水浒》、杨丽君研究《新年梦》与《新中国》,或以“晚清报刊”为切入视角,研究“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有所涉及,或在专著中总体论述而未能详细等。<sup>④</sup>综合研究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问题,尚未见

\* 收稿日期:2014-03-06

作者简介:侯运华(1965-),男,河南上蔡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①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的阶段性成果。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③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④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耿传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齐鲁学刊》2002年第3期;欧阳健:《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超前描摹——陆士谔〈新水浒〉析评》,《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杨丽君:《晚清政治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新年梦〉与〈新中国〉为例》,《文艺评论》2013年第2期;姜红:《“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杨霞编:《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象”》,南京:南京师大出版社,2012年。

研究成果发表。本文拟以民族国家想象为切入视角,以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等流派为研究对象,论述其存在类型、特征、成因、价值等问题。

## 一

小说文本里的国家想象是创作主体对国家形态的具体描绘,其时间向度多指向现存国家形态和未来国家图景,于形象性描绘中寄寓着作家的价值立场、政治理想、文化选择等多重认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家国同构的特征,使得中国国民具有普遍的爱国情怀和关注国事的集体意识,尤其是读书人,更是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捆绑到一起,因而更关心国家命运。众所周知,晚清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由受挫于科场的士子、游离于社会边缘的报人和留学海外的留学生等构成,无论是受自我情绪的左右、社会氛围的熏染,还是受西方文化的刺激,均使其对现存国家形态表示不满,进而以小说描绘所见所闻的丑恶画面,在犀利的批判和夸饰的讽刺中凸显出对国家现状的自我认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等流派中,均有这样的叙事。

谴责小说往往直接表现出对现存国家政体的失望与抨击,这与晚清作家经历太多国家变故有关。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到八国联军入侵等,古老中国一步步走向亡国,作家们对清政府及其管理的国家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正如鲁迅所言:“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揶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sup>①</sup>因此,在谴责小说里,作家从不掩饰对统治者和国家的失望,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创作于1903-1905年,小说以官场为切入视角,抨击国家腐败。第十八回曰:

老佛爷有话:“通天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

一儆百吗?”

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代表的就是国家;其对腐败的放任与应付意味着自我放弃。既然如此,谁还把它视为正常世界呢?故小说第六十回认定当时的中国是畜生的世界:“老鼠会钻,满山里打洞,得进的地方,他要钻。倘若碰见石头,钻不进的地方,他也是钻。狗是见了人就咬,然而又怕老虎吃他,见了老虎就摇头摆尾的样子,又实在可怜。最坏的不过是猫,跳上跳下,见了虎豹,他就跳在树上。虎豹走远了,他又下来了。猴子是见样学样。黄鼠狼是顾前不顾后的,后头追得很紧,他就一连放上几个臭屁跑了。此外,还有狐狸,装着怪俊的女人,在山里走来走去,叫人看了,真正爱死人。猪羊顶是无用之物。牛虽来得大,也不过摆样子看罢了……遍山遍地,都是这班畜生的世界。”这一意象,可视为晚清作家对现存国家政体的彻底否定!由他开启的谴责之风吹遍小说界,吴趼人、曾朴、刘鹗、黄小配、张春帆等各自在代表作中表达出自己对国家现状的否定性认知。

这种对现存政体的攻击与谴责,凸显出作家们对政治现实的认知与绝望,因此,表现在文本里往往是整体的否定或充满危机意识。不仅李伯元在《文明小史》(1903~1905年在《绣像小说》半月刊连载)第一回继续否定政治现实:“除了几处通商口岸,稍能因时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哪——引者校]一处不是执迷不化、扞格不通呢?”因而预言“我们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覆哩!”其他作家对晚清政体的抨击与揭露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士绅阶层对国家形象的负面认知,尤其是刘鹗、曾朴等人的小说。刘鹗因为父辈交往多为高官,对官场特别熟悉,就近观察的结果反映在《老残游记》中便幻化成象征性意象,因此,其对现存政体的否定不是直接喊出来,而是借助于在洪波巨浪中即将颠覆的帆船和谴责作为政体支撑者的“清官”们来

<sup>①</sup>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26页。

表达的。第一回中,那艘二十三四丈的帆船显然是晚清中国的象征,“船主坐在舵楼之上”,不负责任,意味着皇帝毫无作为;象征军机大臣的四人负责“转舵”,面对危局手足无措;象征八部的分管八桅的人,“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加上管船的人(象征下级官吏)乘机搜刮、演说者(象征革命党人)鼓动造反等,至此,中国危机四伏、政体分崩离析的局面已经显现出来。可是,当老残决定送给他们一个罗盘(指南仪)时,却被认为“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因而高喊:“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陷入危机,拒绝拯救,说明其已经病入膏肓。惟其如此,刘鹗才对维系此政体的所谓“清官”痛加贬抑,第六回曰:“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可以说,刘鹗的否定一方面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一方面具有超越同代作家的彻底性。

与刘鹗的形象再现不同,曾朴在《孽海花》中侧重展现面对危局的危机意识。第一回中描写人们惊呼:“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进而推断:“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透出作者对外来压力下国家危机的认识:国家将灭,政体安在?此处奠定全书基调,使其萦绕着难以拂去的危机感。它使金雯青在上海自我否定:“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哪——引者校)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想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才能够有出息哩!”(第三回)如果说前述内蕴是对封建国家、封建政体的否定,这里则是对传统文化意识的否定,也是居于传统国家政体内部核心地位者的自我反省。这样描写,既为小说继续描述社会改革者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与第六回描写中法战争、第二十五回等描写中日战争构成呼应;而战争的具象描摹、改革者的多向探索,则反向启迪读者思索传统政体的腐败与不堪,从而实现否定传

统政体的目标。

在翻新小说的主要文本中,我们也能看到作家们对国家机构、国家制度、国家意识等方面的描述,其中既有对国家现状的否定,亦有对国家未来的想象。这里,我们先论述前者。从创作主体的知识积累和视域所在看,最容易激发其创作激情的是对国家现状的种种不满。研读文本,我们能够隐隐感觉到潜伏文本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向往尧舜禹时代的文人情结,也有对过往盛世的留恋、追怀,还有睁开眼看到其他国家振兴后的对比等。凡此种种,无不凸显出其复杂的内在情感和多维度的国家认知。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在上海《南方报》连载,1908年出版单行本。小说叙述贾宝玉重返凡尘后在近代上海游历并参观“文明境界”,看到东方家族——未来中国昌盛文明的生存场景。在前20回里,以贾宝玉的视角对国家现状进行透视——如第五回上海人“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的生活内容与商行内十家有九家卖洋货的商业情景;第十八回湖南廪生勤王与官场新党、旧党之争等凸显出时人对国家现状的自我认知。尤其是第三十二回老少年的评论:“中国开化得极早,从三皇五帝时,已经开了文化,到了文、武时,礼乐已经大备。独可惜他守成不化,所以进化极迟。”更是点明了传统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原因,是小说家对国家状况的清醒认识。第七回拆吴淞铁路,第十四、十五回义和团进攻使馆和追杀“二毛子”、“三毛子”,第十六、十七回洋人进京以及《中俄密约》的签订等,则表现出晚清时期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对中国认知。两种认知的结合,体现出吴趼人对国家现状的负面认知和对现存政体的否定判断。

《新封神传》、《新列国志》、《新镜花缘》、《新水浒》等翻新小说中也有对传统国家形象的批判性描述。大陆的《新封神传》1906年连载于《月月小说》杂志上,小说开头即以象征性意象否定现实:“忽见东亚细亚,阴霾满天,怨气冲霄,太平洋海水奔腾,汹涌的望着大陆上打来。”当“深眼高鼻,紫须黄发”的人(代指租界

巡捕——笔者注)向姜子牙要护照时,子牙误递金银,那人道:“呸!我问你要护照不问你要钱,这里不是你们中国衙门,一进来便上上下下的要钱。”借他者视角表达对国家统治机构的蔑视与否定。第三回猪八戒劝说姜子牙学外语时的一段话更耐人寻味:“老猪劝你从此总须学两句外国说话。不懂外国话,不但到外国游历要吃亏,就是在上海走走,也狠(很——引者校)不便宜。……洋话会说,那(哪——引者校)一样不可赚钱。做官呢,出使大臣,外务部,洋务局,这几样美差。读书呢,翻译(译——引者校)西书,教授西文,都是一碗好白饭。做生意呢,各洋行的买办,各银行的经手,进账是一年动万。就不做官,不读书,不做生意,那洋人身边去做个西崽,也是不丑。”如果考虑到不久以前国人还以“鸟语”、“番语”来特指外语,那么,作家借八戒的口传达出对外语的肯定理念及其功利价值,则不能不承认是对“修齐治平”的传统国家意识的解构。1908年,佚名的《新列国志》由改良小说社出版,这部旨在介绍西方列国历史的小说,借用《列国志》的外壳,传播着典型的西方理念。第二回,包忠便介绍了福禄特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骚(卢梭)及其民权论思想;第十五回,叙述1803年法国统治者专制残暴,百姓们“各立私会订立章程六条。一曰人人当有举官之权;二曰官必由民公举,随时更易;三曰遍地设官塾,准民间子弟入内读书,不索束脩;四曰官民财产,宜设法整顿,无使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五曰生意行业,必设法流通;六曰宜请各国同心以办大事”;第三十四回介绍法国的上下议院制度,并推崇英国人“立国之道,惟靠自己”(第六回),抨击印度人“不知自教,而待他人来教,将本国的大权柄,轻轻付与别人”(第三十七回)。这里,对西方民权思想的推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和对印度人的丧失自主权的批评等,显然凸显出作者消解传统国家意识、认同西方国家理念的倾向。

萧然郁生的《新镜花缘》连载于《月月小说》第九号至二十三号(1907年10月至1908年12月),共十二回,叙述唐小峰、林之洋等人在“维新国”的经历。无论是第二回对国家机构(官场)的揭露,还是第五回描写长官误将“侨民”听成“教民”而前倨后恭等,均表现出作家对国家意志体现者——官员的否定。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对“维新国”的“立宪”行为进行了解构:“这次改行立宪,也出于万不得已之举,不过欲藉此以塞众口之责。若必翻倒专制,实行立宪,我政府官吏还有甚么威权?没了威权,有何趣味?既没趣味,我们千思万想来做这官吏何用?”<sup>①</sup>通过“长官”的口道出了“立宪”的奥秘,将晚清政治家们推崇不已的“立宪”纳入否定范畴,既体现出创作主体对国家现状的彻底绝望,也凸显出其对“立宪”行为的怀疑、拒绝和迷惘,从而真实表现出晚清作家民族国家想象的复杂与艰难。

陆士谔的《新水浒》第24回,1909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叙述梁山好汉为了顺应时代、下山参与维新的故事。尽管其叙事主体是对立宪运动的调侃与反讽,但也有很多章涉及对传统国家形态的负面描述。第五回戴宗感慨:“我观现在的世界,竟是个强盗世界。不要说做强盗的是强盗,就是不做强盗的,也无非都是强盗,做大官的不顾民生国计,一味的克剥百姓,这样加捐,那样加捐,捐来捐去地,都捐到自己腰包中去,不是强盗么?”林冲道:“此乃是愤世嫉俗之言,如何算得准?”戴宗道:“并非愤世,也非嫉俗,现在的世界,实是文明面目,强盗心肠。”第六回中,吴用也用“文明面目,强盗心肠”概括国家实质。第十五回里,兴业银行的伙计则认为:“现在是骗子世界,你骗我,我骗你。我受了你骗,即把你的骗术还以骗你,你受了我骗,也可把我之骗术还以骗我。上骗下骗,大骗小骗,骗来骗去,无非骗骗而已。”勿需过多引用细节,仅仅是这些感慨便使人感受到小说家对正在实行宪政改革的宋朝(实指晚清)

<sup>①</sup>萧然郁生:《新镜花缘》第6回,《月月小说》第13号。

国家现状的整体否定。而第十二回周通的自述则可视是对国家意识改变的描述:“现在世界讲什么?只要有钱什么不可以。若没有钱,随你怎样忠孝正直,一世也不会发迹。有了钱,休说落过草,即造反过也不妨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固穷”、“重义轻利”的传统流传深远,已经成为国人认同的国家意识。若坚持传统文化观念,这种理念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周通相信的金钱万能的观念,恰恰是对传统国家意识的颠覆。

科学小说侧重立足作者掌握的近代科学知识展开对民族国家未来的想象,基本上是对未来中国的肯定反衬目前已有政体的腐败。但是,也不乏对现存国家政体的否定性描写。《女娲石》、《月球殖民地小说》等小说即对此有多层面的描述。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由东亚编辑局分别于1904年、1905年以甲卷、乙卷的形式出版。小说以张扬女性权益为主,通过几个女性组织反抗社会、反抗男性的行为,表达对现存政体和两性不平等现象的不满。与李伯元谴责现实世界是畜生横行一致,女子改造会的领袖金瑶瑟在第二回里也将世道视为非人道的:“我本想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国奴才。那(哪——引者校)知这些死奴隶,都是提拔不上。”将现存政治体制下的社会视为畜生世界,显然隐含着对政体的否定;而第十五回翠黛、轻燕两个女性所唱歌曲则是对政府的直接控诉:“谁奴谁主谁天下?同食汉毛践汉土。于今大祸捷(睫——引者校)于眉,请后内嫌先外侮,我将此语告政府,政府愤且怒。宁被亡于敌,毋被夺于奴,敌亡犹可,奴夺欺我,可奈何!奈何!奈何!奈何!奈何了奴夺欺我。”这段歌词令人想起慈禧太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名言,凸显出当时人们对于政府的极度失望与无奈。否定了政府,也就否定了维持政府的政体,因而小说第十六回描写金瑶瑟“急欲往各地考察各党情形,一面联络,为他日共和独立之举”,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表现出作

者欲以“共和”为未来国家政体的理想。

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年起连载于《绣像小说》,已刊35回。小说叙述龙孟华因报仇杀人而携妻流落南洋,遇海难而夫妻分离;后遇玉太郎驾气球自日本来,与其一起寻妻到纽约、伦敦、南亚、澳洲、非洲等地,终与妻团圆。在充分展示海外社会画卷、歌颂西方政体的同时,也揭示了主人公离开中国的原因。第一回描述龙孟华之所以背井离乡,就因为刺杀逼死其岳父的权臣而被追捕,凸显出专制制度的残酷。第十二回龙孟华发出质问:“苍天啊!苍天啊!你难我龙孟华也算是难到尽头了,怎样(么——引者校)还不放松些?那满世界中间王侯将相,虽然好的不少,那虎狼蛇蝎似的伎俩,据我眼里所见、耳里所闻的,实在也不为不多,偏偏将我这班人的脂膏供他那一班的快活。……这却是何道理呢?难道你是全然不管的么?”此处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政体如何,但目标直指“王侯将相”,实际上是怀疑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考虑到他是与来自已经立宪的日本国民玉太郎一起寻找妻子、游览欧美的,那么,其中蕴含的对西方政体的向往、对祖国政体的否定意蕴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前述诸流派的小说创作从不同维度展示了晚清作家对传统政体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告诉读者现存政治体制的不合理性,启发人们思索变革之路,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基础。同时,谴责小说对政体的整体否定、翻新小说对政体的多层次揭露、科学小说对奴性与愚昧的抨击等,也为晚清小说描摹民族国家的未来愿景酝酿了氛围,具备了造势与宣传的多重价值。

## 二

对传统国家形态的否定性描述凸显出创作主体对国家现状的极度不满,也蕴含着他们渴望改变国家现状、实施社会改革的愿望。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中国向何处去”?<sup>①</sup>此

①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时,先觉者有强烈的建构民族国家的愿望。梁启超1902年认为:“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sup>①</sup>而民族国家建设是需要参照系的,既需要理念方面的借鉴,更需要国家组织、国家体制、国家意识等层面的变革。能够在这些方面为近代中国提供参照的,是酝酿已久的立宪运动和刚刚兴起的革命运动。

晚清谴责小说的作者对未来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想象。李伯元在《文明小史》“楔子”中肯定“新政新学”,表现出对维新立宪的赞扬。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一回中也借黄龙子的口表达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北拳之乱所以渐渐逼出甲辰之变法,南革之乱所以逼出甲寅之变法。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消灭。……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駸駸进于大同之世矣。”二者或瞩目西方,或聚焦传统,均表现出建构不同于现存政体的愿望。曾朴的《孽海花》则蕴含着更丰富的变革国家形态的描写——既描述称颂民贵君轻的礼部尚书潘八瀛,也刻画宣讲今文经公羊三世说、借孔子之灵为变法开道的唐常肃。他们的理论资源显然是传统文化,希望通过借鉴传统文化中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成分达到重建国家政体的目的。而年轻一代则趋向于否定传统国家意识,向西方寻求改革资源。第二回冯桂芬主动拜访金雯青,告诉他:“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否定传统的“经国济世”的经济观,建构以通晓西方语言、熟悉西方文化为主要内蕴的新的经济观。第十回俄国人毕叶一方面向金雯青介绍虚无党的理论,要把人间假平等变成真平等;一方面直言中国的百姓“哪里晓得天赋人权、万物平等

的公理呢”。以外国人的视角,更为明确地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等级观念不如西方文化的平等观念,直接否定了传统国家意识。第十八回叙述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淑云召集的谈瀛会,论及经营海军、兴办实业、发展教育、言文一致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显然是期望多维度建构新的国家政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讨论救国策略时,金雯青提出:“若论内政,愚意当以练兵为第一,练兵之中尤以练海军为重要。”台霞明确反对,认为“西国富强的本原,……第一在政体”,意识到政体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他们多维度探究改革路向,也就成为必然了。可见,《孽海花》描述了晚清政局中尝试建构国家新机制的多种努力,为读者提供了对国家未来的多向思考。

陆士谔创作的翻新小说《新三国》1909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小说依旧把魏蜀吴三国的竞争作为叙事主线,但叙事背景转为列强环伺、立宪维新的时代氛围;通过吴国、魏国、蜀国相继进行改革,实行变法,却因措施的得当与否、是否抓住立宪的实质等导致蜀国国力大增,最终逼东吴签订屈服条约、远征魏国成功,统一了天下。文本凸显出不变法、国将灭亡的紧迫感,亦表现出改革必从根本做起的深刻意蕴。第一回蒋干上书内容为:“一,易服色以新民目;二,改官制以整吏治;三,立学堂以宏教育;四,创海军以固国基。其余几条,则请改编陆军,举办巡警,兴筑铁路电线,奖励农工商业,派遣学生出洋留学。”这些几乎涵盖立宪运动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作者认可的建构近代国家形态的政治制度。惟其如此,当面临“用夷变夏”的指责时,他让诸葛瑾出面辩曰:“制度管什么外夷中国,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有礼。就可采择施行。我以为外夷之所长,补中国所不足,亦无可。……我辈谋国,须从大处着手,何必拘定成见,执古不化呢?”<sup>②</sup>文本从主体意识方面否定了传统国家意识中的“夷夏之辩”,认识

<sup>①</sup>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2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02页。

<sup>②</sup>张正吾主编:《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

到“师夷之长”的必要性,即表现出为了救国——建构新的国家,反对泥古,博采众长的新理念。

采取这种立宪制度,是否能够成就孙权的霸业呢?该书第四回写道:“吴主权一意富强,力行新政,变法后八九年,创办海陆军,改设新官制,筑造轮船电报,建立学堂等各项美政,次第举行,巴望吞魏灭蜀早成一统,那(哪——引者校)知蜀魏不曾灭掉,自己国势倒先已立不住了。”为什么如此?作者急切插入道:“原来东吴所举行的一切新政,皆是富强之具,而非富强之本。”<sup>①</sup>认识到立宪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还要从根本上做起。为了衬托此理念,小说以十多回的篇幅描写了魏国变法过程中遭遇革命党的冲击、当权派的骚扰等,亦使国势江河日下;然后从十七回开始描述蜀国“下诏立宪”、诸葛亮实施宪政的行为。诸葛亮嘲笑“吴魏所行者,均新法之皮毛,虽甚美观,无甚实效”,表示蜀国将“从根本上着手,必先事教育”。他认为:“古今谋国救时之道,其所轻重缓急者,综言之,不过标本两字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吾国变法,第一要者,须使人民与闻政治,先立上下议院,上议院议员,由皇上特简三分之一,由朝臣推举三分之一,由人民公选三分之一;下议院议员,全由人民公选。一切财政、军政、国家大事,应兴应革,须悉经议院认可,然后施行。”<sup>②</sup>也就是说,蜀国的政治改革是从国家体制上开始的,体制新了,其余皆好施行。应该承认,《新三国》对未来中国的刻画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

对于蜀国的立宪改革,作者不仅在小说中给予其极大的正效应——科技发达,政通人和,为后来的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而且在第二十一回通过议员张裔的辨析,专门区分立宪与专制的不同:“立宪国国民与国君,如家人父子,

专制国皇帝和百姓,如奴才与主人,其不同者一;立宪国则以国为君民之共有物,故君为国主,民亦未始非国主也,专制国则以国为君主之专有物,故人民万不敢以国认为己有也,其不同者二;立宪国凡在一国之内,无论为君为民,为官为吏,皆在法律范围之内,故各有权利,各有义务,专制国则君主不受法律之范围,有权利而无义务,官吏可以枉法害民,权利多而义务少,惟小民则仅有义务,毫无权利,其不同者三。”<sup>③</sup>从君民关系、国权、法律三个层面理清了立宪与专制的利弊,也为蜀国的屈吴灭魏埋下了伏笔。因此,作者才在第二十九回比较吴蜀的成败曰:“只因一国立宪,一国不立宪,立宪的国,是聚众人的智慧以为智慧,其智慧就大得了不得;非立宪的国,只靠着一二人的小智慧,休说孙亮,就是周公孔圣,恐也抵挡不住。所以国而立宪,即庸愚如后主不为害;如不肯立宪,即智慧如孙亮,也靠不住。士谔编撰这部《新三国》,就不过要表明这重意思。”<sup>④</sup>此话既凸显出作家的创作主旨,亦表达了其对立宪国体的认同,还体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对国家未来的清晰憧憬。

与《新三国》的清晰憧憬有别,陆士谔在《新水浒》中则表现出对立宪运动的另类思考。此小说虽与《新三国》同为1909年创作,对立宪运动的态度却迥异。第一回叙述林冲、鲁智深、戴宗三人到东京刺探朝廷动向时,听到路人对“新政”的议论——“此刻行的新政,不论是学堂是矿务,是船下是警察,那开首第一义总是筹画经费,及至经费等到,却都造化了办事几个人。”具体措施何来呢?“却把荆公的法制,改头换面,青苗法改为国家银行,保甲法改为警察局,均输法改为转运公司,市易法改为万业商场,其余学堂、矿务等,也无非做个热闹场面,那(哪——引者校)里有什么真真实实验。”显然,站在普通百姓立场上看“新政”,那是一场换汤不

①张正吾主编:《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②张正吾主编:《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243-244页。

③张正吾主编:《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264-265页。

④张正吾主编:《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换药的改良、不过便宜了少数人而已。第三回描写一场皇帝下令“许颁定国是，许人民参预国政，特诏切实预备，限九年实行”的立宪运动，在选举咨议局议员时，也演变成一场贿选闹剧。第六回吴用在梁山实施新法时，自己认定：“人情莫不好利。现下我们提创的就是金钱主义，只知权利，不识义务。”看重金钱，只认权利，不识义务，是对立宪新政的直接解构。惟其如此，第七回里阮小七才讽刺梁山上的新政曰：“这不成强盗立宪么？万想不到，我们做强盗的，也轮得着有立宪的日子。”可以看出，陆士澐在这部小说里对立宪新政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表面看来，两部小说构成矛盾，实质上矛盾的不是作者，而是其所处的那个社会转型期。正是矛盾百出、弊端纷呈、彷徨迷惘的时代，产生了相悖的国家想象。其存在恰恰证明了近代小说国家想象描写的真实性。

### 三

传统帝国的形象是腐败的、专制的，是被作家们明确否定的；立宪新政似乎合理，却带来诸多失望与不满。面对中国国家未来的想象，还有没有别的愿景呢？处在“过渡时代”的作家们，可否创造出既不同于传统帝国、亦有别于立宪新政的国家想象呢？晚清作家在民族国家想象的路上还能够走多远呢？《新石头记》后十八回、《月球殖民地小说》、《新纪元》、《新野叟曝言》等小说，回答了这些问题。

《新石头记》第二十二回，老少年向贾宝玉介绍“文明境界”的架构：“敝境共是二百万区，每区一百方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统辖四十万区，每区用一个字作符识。……那作符号的字，中央是‘礼、乐、文、章’四个字，东方是‘仁、义、礼、智’四个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个字，西方是‘刚、强、勇、毅’四个字，北方是‘忠、孝、廉、节’四个字。”<sup>①</sup>可见，“文明境

界”是有着独特结构的国家实体，而支撑、维系其存在的符号性理念是传统儒学，凸显出的国家意识为传统儒家意识。<sup>②</sup>正如第二十八回里老少年所承认的：“要问敝境奉的是甚么教，那只得说是奉孔子教了。敝境的人，从小小时家庭教育，做娘的就教他那伦常日用的道理；入了学堂，第一课，先课的是修身。所以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烂熟胸中。这才敢把‘文明’两个字，做了地名。”显然，与吴趼人的其他小说作品一致，作家对传统的国家意识是认同的，传统国家意识是吴趼人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基础。

如果吴趼人停留在此，那么，他与同时代作家没有太大的差距。吴趼人建构国家意识时，还吸收了西方的“自由”、“竞争”等理念。他认为自由有文明、野蛮之分：“大抵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饬；越是野蛮自由，越是破坏秩序。界乎文野之间的人，以为一经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国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才可以说得自由。”<sup>③</sup>对“自由”的认识与自治能力、法律意识结合起来，应该说吴趼人的自由观已经站在时代前列。至于“竞争”问题，第三十五回东方法说：“若要竞争，便和外国人竞争，何尝没有竞争呢？可笑近来的人，开口便说同胞，闭口也是同胞，却在同胞当中分出多少党派，互相攻击，甚至互相诟骂。……靠了这种党派，要求竞争进步，不过多两个小人罢了！有甚么进步呢？”强调增强国内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内讧，亦即倡导对国家有利的“竞争”，反对为了一己之私而内耗。如果有了受法律约束的“文明自由”，加以增加全民凝聚力的“竞争”，那么，何愁国家不强？还怕国人是一盘散沙吗？

受其融汇中西的国家意识的影响，吴趼人

①[清]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6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②这与学界对吴趼人思想的认知一致。如任访秋《吴沃尧论》指出：“吴沃尧是一个受儒家思想束缚很深的人。”（《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6期）

③[清]吴趼人：《吴趼人全集》第6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回，第182页。



等作家对国家政治体制做出了独特的选择。萧然郁生创作的《新镜花缘》第六回曾批判“维新国”只得维新之形却失去其本质：“唉！维新维新，那（哪——引者校）里教你们在这些上新，要新的是新精神，新魄力。精神新，魄力新，再新教育，新政治，新风俗。”强调推行教育改革，才能够创造新的国家。《新石头记》第二十六回老少年叙述“文明境界”的建构过程时，强调先把字典里的“盗贼”、“奸宄”、“偷窃”等字删去，再将京中刑部衙门各区刑政官、警察官裁去；然后评论世界上的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现在我们的意思，倒看着共和是最野蛮的办法。……就是立宪政体……便闹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我们从前也以为专制政体不好，改了立宪政体。”但是，后来信奉大英雄万虑的办法，重视教育，强化德育，“德育普及，宪政可废”，最终恢复了专制政体。当宝玉表示赞同时，老少年进一步阐释：“未曾达到文明的时候，似乎还是立宪较专制好些。……所以野蛮专制，有百害无一利；文明专制，有百利无一害。”这里，集中传达出晚清知识分子对国家政体的认知——仅仅是外在形态模仿西方，借鉴其政治体制，是难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只有从教育做起，强化德育，才能够在保存专制政体的前提下，抵达“文明专制”的理想境界。

对自我设计政体的充分信任，使得吴趸人设想中国未来肯定能够成为世界强国，故《新石头记》第四十回里，一方面在上海浦东召开“万国博览大会”，一方面在北京召开“万国和平会”，中国皇帝被推举为会长。这是两个梦——前者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并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后者意味着中国政治地位的提升，不再是受列强欺负的弱国，而是倍受他国尊重的国家。梦的背后，是作家建构国家形象的殷切愿望和改变国家现状的急切心情，亦凸显出作家对所选择政体有可能抵达境界的殷切期待。

在建构国家未来形象方面，走得更远的是科学小说。笔者以《月球殖民地小说》、《新纪元》、《新野叟曝言》等为典型文本，论述其民族国家想象。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一方面主张“教育救国”，第四回濮心斋赞扬唐蕙良“第一件事业，还是从教育设想。倘是教得我几万万个女子都像小姐一般的懂得道理，还怕什么事业不成”，第三十五回，唐蕙良“替国家挽回气运的计策”便“广开学校，造就国民”；一方面让主人公巧遇月球人，梦游月球世界，在“地球栖流公所”见一座大殿坐着三位大人——释迦牟尼、孔子和华盛顿，是为公所三首领（第13回）。第三十二回则担心一旦月球人来地球殖民，“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的大劫了”。可见，作者既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国民素质，建构新的政体；亦凸显出冲破文化藩篱、超越狭隘民族立场的意识，为所有地球人的前途担忧。《新纪元》是碧荷馆主人创作，1908年由小说林社出版的。小说描写1999年爆发的黄白种人之间的大战。此时的中国，已是成熟的立宪国家，科技发达，军队强大，故能够打败白种人联军。值得注意的是引发战争的原因——中国决定自2000年起改用黄帝纪年。这一中国内政为何激起西方白种列国的强烈反应呢？有学者认为：“显然是作者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激励，以幻想的方式曲折表现出的强国愿望。……‘纪年之争’被作者作为战事的发端（同时也是世界秩序重组的开始）加以渲染，正是‘内争民主，外争族权’的时代思潮在文学中生动的反映。”<sup>①</sup>此文本反映出的内蕴已非改良传统国家政体，而是通过改革政体，建设超强国家。作为此意蕴载体的黄白之争，则有着鲜明的民族、种族色彩，表现出晚清作家将民族国家想象的诸多问题梳理不清的困惑以及急欲超越现有政体、抵达强国目标的愿望。

如果说《新纪元》欲通过击败白种人、征服

<sup>①</sup>李广益、陈楸帆：《〈新纪元〉研究》，吴岩主编：《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福州：福建少儿出版社，2006年，217页。

欧洲来显示未来中国的强大,尚未超越地球视野,那么,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和高阳氏不才子的《电世界》则以征服宇宙来凸显雄心了。《新野叟曝言》1909年由改良小说社出版,叙述欧洲不满作为中国的殖民地,成立“光复会”欲反抗;皇帝派文素臣为大元帅,统率飞艇前往镇压。征服欧洲后,他又开发月球和木星,发现木星适宜移民。于是,皇帝任命其为木星总督。《电世界》载于《小说时报》创刊号(1909年9月),主要叙述2009年电王黄震球充分利用电学知识,发明电气枪击毁西方飞艇、制造空中电车方便民生等,最后制造空气电球,飞向太白星,欲为人类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与谴责小说的愤懑不平、充满危机意识不同,与翻新小说受制于原著的格局迥异,此文本凸显出作家超乎寻常的自信——一方面彰显电的作用,使其成为强国保种的基础;一方面相信中国很快就能强大起来,征服世界。小说第一回曰:“诸位同胞,不必再忙别的。只要就这电力上用一些功夫,掷一些资本,不消五十年,中国便稳稳的做全世界主人翁。”为了印证这一点,第四回描写电王用一把电气枪把西方飞来的一千多只飞行舰烧得如死鸟般落到太平洋底了。显然,作者急于表现电之威力,亦表现出内心深处希望中国战胜西方的急切愿望。对于国家政体,小说没有点明,但是遇到重大事情,大臣聚集商议,皇帝也不再称呼大臣为奴才等,证明现存政体接近立宪制度。然而,作家的理想并非局限于立宪,而是糅合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念,尽力描摹一个超越现实的国家想象。第六回可以看到,国家物产丰裕、资本家道德进步、物价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人民便也没有极贫极富,岂非真正大同世界”?此后,电王又开发南极、北极以及海底世界,拓展地球人的生存空间。至第十六回,文本描述2110年的中国已经造成统一世界,建成了大同帝国;由于担心后世子孙缺乏生存空间,黄震球决定去太白星寻求新的发展区域,表现出征服宇宙的雄心。应该承认,这些文本达到了当时人们有关国家想象的顶峰,它

对中国未来的希望不仅仅满足于富强自足,或不再受西方列强侵略,而是期望国家不但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能够征服宇宙、移民其他星球。因此,笔者认为这应该视为晚清作家对国家未来的终极想象。

#### 四

描述晚清作家关于民族国家想象的不同画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构成奇观。此前的中国古典小说里,虽然有海外仙山的想象,有《西游记》对唐僧所经车迟国、宝象国、乌鸡国、女儿国、天竺国等神怪国家的描述;或如《镜花缘》的君子国、女儿国、不死国、两面国、无肠国、穿胸国、犬封国、淑士国、毛人国、大人国、小人国、长人国等40多个奇奇怪怪的国家;抑或似《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中描述的魏蜀吴等国;但是,它们或为虚构的产物,或是历史的存在,均不具备近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特征。此后的民初小说和现当代小说中,也有对国家未来的想象,却浸染着政治色彩,承载着救亡的重任,内蕴与形式均不及晚清小说中这么丰富。因此,有必要探讨其成因。

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有独特的政治、社会成因。晚清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列强入侵四边、国内暴动不断的危局,统治者忙于应对外敌、压服内乱,因此,思想控制放松,使社会结构出现裂隙,浸淫已久的思想权威渐趋消失,思想解放思潮兴起,作家们抨击政局、抒发感慨、描述理想成为可能。不仅如此,当中国必须变革才能生存成为共识、需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时,面对这一全新课题,一时难以出现众望所归的见解,呈现出“无解”状态。惟其如此,才留给晚清小说家发挥的空间,导致有关民族国家未来的新解频出,建构起多维度的民族国家想象。正如有学者所言,面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指向未知世界的问题,答案自然会多种多样,加之中国幅员广袤、历史悠久,情势逼迫中国人必须在短时期内形成足以调动全社会资源的政治—文化设计,其最初的

反应必定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sup>①</sup> 来自中国内部改革的强烈需求形成了“诸说杂陈”的局面,虽然使当时的人会产生无所适从感,却带来小说世界里民族国家想象的百花盛开,成就了此类小说的繁荣。

论及民族国家想象纷呈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各种社会思潮泉涌的氛围,需要理清影响晚清作家民族国家想象的思想资源。笔者认为,其思想资源有中外之分。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能够为作家们的想象插上翅膀的是大同理想。无论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中推断的“大同”社会、科学小说《新纪元》和《电世界》中征服西方民族后所建构的平等世界与“大同帝国”,还是翻新小说《新水浒》中维新后的梁山空间、《新三国》中蜀国征服吴魏后抵达的社会境界,甚至《新石头记》里东方家族治理下的“文明境界”以及《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令人向往的海外孤岛等,均凸显出“大同”理想的印记。就西方思想资源而言,西方进化论、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对此类小说的影响巨大。进化论是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包括广义的进化论和狭义的进化论。前者“包括宇宙无机论的进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进程,其中生物的进化是非生命进化到人类社会进化的中间环节”;后者“是指达尔文以来的生物进化论”。<sup>②</sup> 进化论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影响主要得益于严复的翻译与介绍,它成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建构社会改革观念的基础。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精神有两层:“其一是肯定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其二是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逐渐积累的过程。”<sup>③</sup> 因此,他们强调改革,却反对采取激进的方式,倡导开启民智、发展教育实现其政治目标。谴责小说作者喜欢

在序言或批注中畅言文本的启蒙价值,表现出对立宪运动或向往、或讽刺的矛盾态度。翻新小说作家或如《新三国》、《新水浒》,让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江湖好汉们走出山寨,创办学校、书局,成就维新事业;或如《新石头记》先叙述专制体制下的腐败,再描述进化后的“文明境界”。科学小说如《新纪元》让主人公走出国门、留学海外,然后再回国办学、办刊,实现强国梦,征服白种人;或如《月球殖民地小说》中让唐蕙良等人专门开办新学、振兴教育等,均可发现这种思潮的影响。因此,进化论思想的传播成为近代作家选择立宪政体的理论基础。

科学主义是随着西方实证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内涵是:“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只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人间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只要贯彻科学的原则,一个人间天堂就将不期而至。……科学不再是一种有具体的对象、只在特定领域中有效的知识形态,而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不再是一种实证性的(positive)认知成果,而被转化成一种规范性的(normative)的评价尺度。”<sup>④</sup> 其存在不仅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科学、相信科学具有战无不胜的功能,如《新纪元》第八回所言:“十九世纪以后的战争,不是斗力,全是斗智。只要有新奇的战具,胜敌可以操券。……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战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更典型的是,在晚清小说里,科学已经不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成为一种价值立场,甚至成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此类小说中,凡是叱咤风云、屡立战功或成就功名者,多为留学欧美、具备科学思维者。他们拥有近代科学知识,便等于拥有了强国富民的捷径,于是,有了《新水浒》中

①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②陈卫平:《世纪末的新世界观——进化论思潮》,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③陈卫平:《世纪末的新世界观——进化论思潮》,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④杨国荣、郁振华:《融入与逸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思潮评析》,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对戴宗所带法码的电学解释,有了《新三国》中类似直升飞机似的侦察工具,有了《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环游地球的气球,有了《新石头记》中能够测量人的品质和行动便捷的飞艇、潜水艇等。更有甚者,如《新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凭“科学”征服白种人并当了木星总督,《电世界》中的黄震球研究自然电,一只电气枪焚毁欧洲上千飞艇,使国人对其顶礼膜拜,并开发南北极和海底世界,最后飞向太白星探险等。可见,此类小说里,“科学”成为建构新型政体、实现强国梦想的工具,亦为推动叙事进程的关键因素;作家对“科学”的态度,也由推崇提升到了迷狂、迷信的程度。

无政府主义对晚清作家民族国家想象的建构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本身是一个相当庞杂的体系,其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被中国知识分子有选择地接受,并针对晚清专制统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学界如此概括其特征:“第一,反对强权压制,排斥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治组织,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第二,仇视私有制度,描绘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图式。”“第三,强调人的社会公平地位,主张权利和义务均等。”“第四,提倡废姓,抨击宗法家族制度。”“第五,幻想革命即日成功,宣扬暴动、暗杀的恐怖思想。”<sup>①</sup>这些思想经过报刊、书籍等传播开来,融汇到晚清作家的小说创作中,转化为颠覆传统政体、建设新型政体的手段。谴责小说《孽海花》中既有对虚无党刺杀行为的大段描写,也有对其理论的阐释以及借其言语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抨击。科学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第二十四回濮心斋、玉太郎等进京救李安武等人,第二十九、三十四回孔文、孔武刺杀骗子和奸党的行为等,是典型的通过暗杀实现目标的无政府主义做派;而第三十回中所描绘的飘飘庐情景,则是没有等级、宗法,人人平等、远离俗世的理想图式:大洋孤岛,遗世独立的老翁,随意飘荡的小船,“不许残害

生命”、“等闲不得哭泣”以及对“轩辕黄帝造下了杀人的器具,把世界上扰乱得不成样子”的认知等。旅生的《痴人说梦记》原载《绣像小说》,1904-1905年出版。该小说通过几位立志维新者的奇异遭遇,描述一代青年的理想。其中,对海外多处荒岛的描述,一方面凸现其愚昧落后,一方面表现其安宁平等,主人公最终在仙人岛实现立宪政体,并表示“这就是我们中国将来的结局”。<sup>②</sup>这种海外“仙人岛”的勾勒,既有几分“桃花源”色彩,更多无政府主义韵味。文本价值取向的芜杂,恰恰说明无政府主义自身的内蕴复杂以及对晚清作家影响的多向性。

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还有文学本体的传统。政治氛围、社会思潮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固然不容忽视,但是,文学自身的传统则是更直接的渊源。全面论述此问题非本文的任务,笔者聚焦于小说创作的渊源追溯,且以影响最大的梁启超为例,阐释这个问题。从理论倡导方面看,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功能的认识、小说地位的提升均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尤其是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第一号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的价值估量为“新民”,从道德、宗教、风俗、学艺、人心、人格诸方面,以不可商讨的语气肯定小说能够使其焕然一新。由于梁启超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创办《新小说》(1902)等小说刊物传播自己的理念,使得其小说理论产生了他人难以匹敌的效应。晚清作家的创作理念,几乎无外乎梁氏阐释的范畴。是年,他提出欲救国必先创立民族国家的主张;次年,访问美国后,他撰写《开明专制论》,成为开明专制的鼓吹者。这些思想,一方面使晚清小说家们不再视创作小说为雕虫小技;一方面直接影响到众多小说家的文本内蕴,如《新石头记》中的“文明专制”,《电世界》中电王的开明政策等。从文本方面考察,

<sup>①</sup>齐卫平、钟家栋:《向着“无何有之乡”——无政府主义思潮研究》,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2-295页。

<sup>②</sup>旅生:《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痴人说梦记》第30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4页。

《新小说》刊载的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翻译文本,既提供西方立宪政体的模板、自由平等的思想资源,亦描绘出西方文明的具象,成为晚清小说创作的形象资源。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刊载于《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借维新志士“曲阜先生”之口引出故事,叙述60年后中国已经富强,庆祝维新成功50周年大典在南京举行。曲阜先生讲述中国振兴的历史,叙述黄克强、李去病等人的救国思想。此文本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有影响:其一是政体层面,否定现存政体,肯定立宪制度。第三回,李去病认识到中国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中国:“十八省的地方,那(哪——引者校)一处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呢?”探究原因,他认为罪在政府:“你看现在政府,要说外国人放一个屁,都没有不香的,他要什么,就恭恭敬敬拿什么给他;他叫做什么事情,就要屁滚尿流做什么事情;他叫杀那(哪——引者校)个人,就连忙磨刀杀那个人。”因此,他与黄克强一起研究“政体”。他主张采取激进方式,通过革命建立共和体制;黄克强则主张渐进改革,认同立宪政体。其二,宣扬进化论思想,抨击传统国家意识。黄、李均接受进化论,但理解有差异。黄克强相信新的必然战胜旧的,但认为“旧的必先胜而后败,新的必先败而后胜”,为其立宪缓进思想做辩护;李去病则强调物竞天择、顺应时势,“专制政体是一件悖逆的罪恶”(第三回)。第五回中,主张排满革命的宗明要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统统打倒,“因为他们造出甚么三纲五伦,束缚我支那几千年,这四万万奴隶,都是他们造出来的”,直接提出推翻传统国家意识,对后世影响更大。其三,看重教育事业,侧重人格养成。小说叙述人是“全国教育会会长”曲阜先生,“专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第二回的演讲中,他认为:“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具备,……民德一桩,是难养成。”第三回黄克强与李去病辩论时,也强调“只有养成人格一件是最难不过的”。晚清小说建构民族国家时,聚焦宪政、彰显革命、抨击传统、宣扬进化、注重教育、凸显人

格等内蕴,主人公对立宪的矛盾认知、对革命的推崇与疑惧心态等,均可看到梁启超小说理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综观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存在诸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此类小说抨击传统政体,憧憬西方立宪制度,但是,对于宪政的态度往往是既向往亦批评的矛盾态度;甚至不少小说中都有对通过革命建立共和政体的讨论与尝试。这种矛盾凸显出所移植西方政体与中国近代社会环境的排异性,也说明中国社会选择政体必须面对中国现实,并顾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其次,实现宪政的条件,小说并非特别看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多强调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素质,培养其近代人格,使其具备立宪的资格。这一现象的形成,既因为晚清正处于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学习西方,进而从文化层面反思传统文化的时代,也引发了中国现代对国民性的思考。再次,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深受作家“前理解”的制约。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殖民租界的历史记忆等,皆成为创作主体的文化积淀或情感创伤,因此,在文本中建构大同世界,征服白种人以后逼迫其签订屈辱条约,成为科学小说等小说流派的叙事模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畅想画面,凸显出作家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历史感受。最后,晚清小说极富“想象”色彩,缺乏“科学”依据。我们能够看到作家们利用自己有限的科学知识,极力渲染主人公使用武器如飞艇、电气枪、潜艇等的威力无比,可是,当他们尝试阐释其科学原理时,往往笼统言得自西方,或直言无法解释。这就造成具象描写不够生动,抽象解说苍白无力,进而影响到小说的阅读快感,没有抵达其应该达到的艺术高度。当然,作为后来者,我们的反思并不应该影响对其价值的评估;其存在,仍然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

梁启超曾感慨中国人只知“天下”而不知“国家”:“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

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sup>①</sup>亦即中国传统意识中是缺乏“国家”意识的。处于这种情势之中,晚清小说家们初步确立起民族国家意识、展开民族国家想象时,必然呈现出矛盾、多向的特点。作为“参与型知识分子”<sup>②</sup>,以各自的知识积淀为基础,展开对未来民族国家的想象,为国人提供了未来中国的不同蓝图。我们可以批评其政体建构的不尽合

理,可以认为其政治理想的过于超前,甚至为其国家想象的简单、幼稚而不满;但是,却不能忽视其中蕴含的思想意蕴与文学价值——启迪后人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建设民族国家,思考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生存空间等;亦表现近代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国政体的想象,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借鉴。于此,即可凸显晚清小说民族国家想象的价值。

##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iction: With Condemnation Novel, Reinvented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as Primary Examples

Hou Yunhua

(Liberal Arts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Abstract:**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iction assumes multi-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It criticizes despotism and eulogizes constitutional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ttacks the republican regime, and even yearns for a “civilized despotism” and extreme imaginations beyond the earth as well. The form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both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modern China, and tha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hought of great harmon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variou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Western culture such as evolutionism, scientism, and anarchism and so on. And neither is the influence exerted by Liang Quichao’s theory and his novels to be ignored. All of these are rich in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literary values. That is, they have enlightened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o build their national state in a more scientific and more reasonable way, and to ponder over the survival mode and living spa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y have, too, demonstrated that modern intellectuals’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regime in the future has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fiction;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 condemnation novel; reinvented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责任编辑:孙昕光

<sup>①</sup>梁启超:《爱国论》,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2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61页。

<sup>②</sup>胡伟希认为:“所谓参与型知识分子,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及政治生活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关心,并试图积极‘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政治上的参与,并不以谋取官职为终极目的。”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